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生命线”

——读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 卢毅

组织路线是贯彻落实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保证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发表了题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重要讲话，充分揭示了组织路线的极端重要性。重温这篇讲话，对我们今天全面深入理解并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

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邓小平同样重视思想建设，并将之视为基础性建设。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讲话中，邓小平首先回顾并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过程，指出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他强调：“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因此，“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

组织路线的最重要问题是选拔培养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很多老同志重新恢复工作，这在一段时期是必要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各级领导班子岁数较大、精力不够的问题。有鉴于此，邓小平提出：“组织路线，有党规党法问题，有组织纪律问题，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他在讲话中举了王洪文1975年说“十年后再看”的例子，明确指出：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要想得远一点。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干部的标准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邓小平强调：“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所以，“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邓小平还指出，组织路线包括很多方面内容，但目前“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这里连续用了三个“最”，足见其心情之急迫。他号召大家解放思想，打破论资排辈的框框，加快选拔培养年轻人，“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

始终高度重视组织路线问题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这篇讲话篇幅不长，但言简意赅、主题鲜明，核心观点就是最后一句总结：“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在此，“两个保证”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一方面深刻揭示了制定和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对贯彻落实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形势提出了尽快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任务。此后，邓小平在其他场合又反复阐述这一观点并有所发展。1979年11月2日，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指出，现在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

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完整提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四化”方针写入党章，成为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再次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组织路线问题。201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引用邓小平“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这句话，来论证我们党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这也与邓小平高度重视培养接班人的观点一脉相承。2020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重申：“党的组织路线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正确政治路线决定正确组织路线，正确组织路线服务保障正确政治路线。”再次提到了邓小平的观点。他指出：“党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坚持正确组织路线，党的组织就蓬勃发展，党的事业就顺利推进；什么时候组织路线发生偏差，党的组织就遭到破坏，党的事业就出现挫折。”纵观党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壮阔历史进程中，不断深化对党的组织路线的认识，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可以说，党的组织路线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保障线”，也是党的事业的“安全线”。而正是在这点上，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讲话更凸显出历久弥新的重要思想价值。

在机关工作久了，大多数同志业余时间喜欢写点东西。有些人写好喜欢放着，留给自己慢慢欣赏；有些人则喜欢找个平台发表，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感悟。我本就是学新闻出身，这些年一直在不同层级的机关从事文字工作，闲来也常写些散文、杂文、诗词、小品等东西，我的习惯是写出来就在报刊上发表，所以对各类报刊比较关注和留意，平时也喜欢做点案头工作，研究各类报刊的特点，目的是有针对性地投稿。

真正关注《学习时报》是24年前，这张报纸刚刚创刊，吸引我的是它开始亮相的时候，办得非常有自己的特色。严格地说，它倒不像一张完全意义上的新闻类报纸，更像是一个理论交流平台。从报头设计和内容选择都是一副板板正正的样子，文章一般发得比其他报纸的长，内容好看，能长知识和见识，体现了中央党校的水准和特色，每篇文章都让人看得比较过瘾，特别是理论性的文章体现了求是精神，文史类的文章也具有现实的针对性。虽然这些年《学习时报》一直创新改版，但这些特色特点都坚持得比较好，没有丢，这也是我成为这张报纸忠实读者的原因之一。

真正钟爱这张报纸与之结下深情厚谊，是因我还是它的作者，积极为这张报纸写稿。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搅乱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武汉告急，病毒来得如此凶猛，所有人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面对危难，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医疗战线上的勇士积极响应，主动请战，报名去武汉。然而有一支队伍非常特殊，就是由解放军原第四军医大学转业军官们组成的医疗小分队，他们在第一时间赶到了武汉疫情的第一线，投入了战斗，凭借精湛的技术、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抗疫前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来自四面八方的退役军人以各种方式支援武汉，投身到抗疫最前线。我作为一位曾经的军人，被战友们行为深深打动，一口气写下了《永远的战士》这篇散文。

稿子写好了，到哪里刊发这倒有点难住了我，思来想去，想到了《学习时报》的一位好朋友，于是把稿子试着发给了他，请他转给相关版面的编辑。让我没想到的是在当天就接到了编辑的电话，她上来就叫我“赵老师”，正是这一句称谓让我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在诸多称谓中，我最喜欢别人叫我老师。她做了自我介绍后，告诉我稿子写得很感人，很快就能发出来。我非常高兴，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很快，稿子刊发出来，我一字一句地阅读对比，发现由于初稿我写得比较仓促，当时的的心情也十分激动，给出去的稿子写得比较粗，可经过编辑调整后，稿子一下子变得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语言生动、上下通顺，既保持了原稿的原汁原味，又能一口气读下来，她的编辑为文章确实增色了不少。虽然这么多年我没少发文章，但这一回还真让我感动了，不光发表了文章，还遇到了一位好编辑。

后来我在《学习时报》陆续发表了《心向延安》《梦中雪屋》《黑土地上的红高粱》《山中，那一束束探

编辑与作者的『双向奔赴』

我与《学习时报》共同创作好文章

□ 赵安华

动的杜鹃花》《“煮海为盐”话盐城》等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有的还被一些党报党刊转发，阅读量非常高。在《学习时报》所发的每一篇文章，都凝聚着编辑的心血，在我写稿前，他们都会给予写作上的指导，中间经过反复沟通、商量，最后才由我来执笔。

一次在与编辑聊天时，聊到我常写歌词的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编辑随后到网上搜索了我创作的歌词，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赵老师，没想到您在歌词创作上有这么大的成就，您看看能不能从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的文化修养、培养健康情趣的角度，谈谈怎么写歌词？”她向我提出了“以什么是歌词”“怎么写歌词”“词和其他艺术种类的关系”等几个角度，各写一小文章，组成歌词创作系列谈，我们又经过几次探讨最后写成了《写词不失为一种健康情趣》《词中自有“桃花源”》《有心处处皆是词》《我心永驻桃花源》四篇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好。为喜迎建党百年，《学习时报》策划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歌词征文活动，这个活动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热烈响应，我也踊跃拿起笔为这次活动创作了歌词，最后经专家和读者投票，我写的《东方之光》歌词还获得了前几名。

《学习时报》的编辑队伍是一支很强的团队，正是有这样一批责任心很强的好编辑，这张报纸才得以发展壮大。正是有了这些编辑们的辛勤付出，并与一大批高水平的作者保持长期联系，才共同策划、共同创作出了一篇又一篇高质量的文章，让广大读者受益。值此《学习时报》创刊25周年之际，我向所有编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愿以后我们的这份缘分更深、这份情更重，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共同办好这张报纸作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组织部）

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其民族精神不坠”

——读〔美〕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论中国》

□ 李海涛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是美国前国务卿，20世纪全球知名的外交家。1971年，他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访问中国，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又访问中国一百多次，与中国的领导人有过许多交往，他说：“我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

基辛格所著《论中国》是一本关于新中国外交的著作，在书中，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要重大外交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度解读，还根据自己与新中国多位领导人的谈话记录，讲述了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之间的相互交往。基辛格秉持着一位资深外交家独特的研究观察，尝试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揭示新中国外交决策中的文化和思想，书中的分析思考对于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对外政策历史及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的对外交往是防御性的

作为外交家，基辛格敏锐地发现了中西方战略文化的不同，并且能够较为清晰地理清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外交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他认为，在传统的国际交往中，与西方的国际交往不同“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其宫廷盛典，而是深远的战略眼光和谋略”。其次，他总结出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所建立起来的体系的“目标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尽管中国始终居于这个体系的中心，但是“同后起的其他区域性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自足的帝国，对扩张领土并不热衷”。最后，他指出，在面对冲突和战争的时候，“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为此，他专门

以国际象棋和中国围棋作了对比。总的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对外交往是防御性的，且具有和平性。

基辛格对于凝结着中国古代传统军事文化的著作《孙子兵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发现其中用“势”代表力量强弱及总体趋势的不断变化是西方没有的概念。即在战争中，气候、地形、外交、情报、供应和后勤、力量对比、历史观，以及出其不意和士气等无形因素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军事形势和相对优势的变化。基辛格认为，“即使在今天，《孙子兵法》一书读起来依然没有丝毫过时感，令人颇感孙子思想之深邃。孙子为此跻身世界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行列”。

“中国人民靠着坚忍和自信，通过艰难抗争为日后中国的复兴带来了希望”

基辛格在其外交生涯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与中国打交道，他帮助美国总统一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在后续的几十年间一直与中国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在论及中国外交基本特性时，他在书中提及了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沿袭了中国古代的智慧与传统，他认为中国制定战略一般有三个特点：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仔细研究战术选择和冷静探讨行动决定。他对新中国三位领导人的印象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历史传统的继承者。对于毛泽东，基辛格认为他在制定外交战略时有着巨大的灵活性，认为他所参考的“是中国的古典著作”。对于周恩来，基辛格描述他为“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认为

周恩来能够“以其智慧力求以理服人或以智取胜”并且总是“善于乘时乘势”。对于邓小平，基辛格对其在中国改革开放时候的政策选择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邓小平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靠煽动情感或中国的民族主义去号召本国人民，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求助于中国古老的价值观：面对困难镇定自若；注重调研；目标专一”。

二是基辛格对中国外交的理解始终基于一种人民大众视角。他清晰地看到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人民的力量，认为“中国人民靠着坚忍和自信，通过艰难抗争为日后中国的复兴带来了希望”，“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都能坚持其民族精神不坠”。而对于当代中国国家外交中的基本力量，基辛格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解放人民、团结人民所产生出来的巨大“国家能力”。在基辛格看来，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解放了人们的传统束缚从而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希望在建设好中国的基础上在世界上发挥影响力。基辛格指出，“中国革命若要对世界产生影响，也只能通过中国人民的努力和榜样的力量。毛泽东一直相信中国人民最伟大”。改革开放解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释放了人民的力量，引导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而且也是精神上的壮举”。

“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

基辛格与传统的记者、学者之类的“中国通”们有一个较大的区别，那就是他和中国的政治高层保持密切联系，能够在几十年间不断观察、总结中国外交的基本特性，为中美两国的发展提供有益思考。在研究中美两国之间斗争与合作的历

史后，基辛格直接指出：“美方并不能完全理解中国人执着的自力更生理念。”中国在对对外合作中始终秉持着独立的理念，“要把自力更生变为一种武器，在双方看法一致的基础上将其变为一种互助的方式”。

在《论中国》英文版出版的2011年，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延续着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访华时探讨的趋势向前发展着，但美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基辛格认为“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和世界角色。美国这么做应是出于传统理念，而不是为了与中国比赛。提高竞争力主要是美国的事情，我们不应让中国代劳”。而中国“为了实现它心目中的国家命运，将继续发展经济，在亚洲及以外的地区寻求广泛利益”。为此，他对两国关系发展提出的建议是：“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作为参与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并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外交家，基辛格认为中美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并且呼吁两国要避免“冷战”，因为“两国之间的冷战会扼杀太平洋两岸一代人取得的进展”。为此，他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的理念作为双方关系发展的建议，而这一理念也明显与中国的传统外交观念相呼应。

从外国人著作看中国